

【中】黎贵才（**Guicai LI**）卢 荻（**Di LU**）

个人简况

黎贵才, 长春税务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大街3699号长春税务学院《当代经济研究》编辑部

邮编: 130117

电话: 15843103829 (M)

Email: ligc118@sina.com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演进的就业效应

【中】黎贵才 卢 荻

内容提要：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经济从原来的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转变为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前一种增长模式能够实现产出和就业的双重增长，缺陷在于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产出增长；后一种增长模式能够促进产出增长和劳动报酬的提高，缺陷是创造就业的能力表现不足。但从现实性来考虑，后者比前者更具可行性。一方面是因为消费需求增长的放缓使得经济增长必须转而依赖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增长放缓是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后者较具动态规模效益，比前者更能促进生产率的提升。

关键词：经济增长；就业；资本深化；需求；动态规模效益

自改革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和就业都在迅速增长。在1978-2007年间，劳动力供给从4.07亿增加到7.86亿，就业人数也从4.02亿增加到7.70亿。换言之，在这29年间，中国劳动力的供求都几乎翻了一番。^a与劳动力扩张和就业增长扩张相关的是，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相应期内，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4倍多。这种伴随就业大规模扩张的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标示着大部分中国人民在这种增长态势中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同时增长也是中国政府在改革以来，尤其是世纪之交以来力求实现的目标。

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路径与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完全相符。诚然，在改革的大部分年份（尤其在改革的前半期），中国的产出的增长主要靠增加就业来推动。更确切地说，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规模巨大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增长呈现“资本深化”特征，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在工业部门尤其愈趋显著。结果，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日渐衰微。与90年代的前期相比，近年来就业的增长要严重滞后于劳动力供给的扩张。

本文拟通过对改革以来两种增长模式效率特征的讨论，和对构成增长方式转变体制和结构原因的分析，来剖释两种增长模式的就业含义，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就业的影响，并进而对两种模式的现实可行性作出评价。

一、中国劳动力供给、就业与经济增长

自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经历了很不相同的两个阶段，即1979-1989年的劳动密集的增长与1990至今的资本深化的增长两种增长路径^b。这两个时期有两种

a 除特别说明外，全部的中国数据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各年数据。

b 将自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分成1979-1989年和1990-2007年这两个时间段，一方面是这两个

不同的就业表现。图1显示了这两个时期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增长的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观察到两点：第一，后一时期的劳动力供给和就业的增长率都明显低于前一时期；第二，前一时期就业的增长率高于劳动力的增长率，而在后一期则正好相反。第一个观察结果表明，当劳动力供给下降时，就业也出现相应的减少。这意味着就业的增长有赖于劳动供给的增长，即显示了就业决定的“供给方”的作用。第二个观察结果表明就业的增长并非是随着劳动力扩张而自然跟进的过程，即显示了劳动力供给以外因素，主要是需求因素对就业决定的影响。而且在后一期就业的增长滞后劳动供给的增长愈显突出，说明需求约束对就业的影响愈趋明显。

图 1。劳动力与就业的增长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为进一步考察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对就业决定的影响，根据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趋势，我们将这两个时期分成以下五个时间段来进行考察：1978-1984年、1984-1989年、1990-1996年、1996-2002年和2002-2007年。表1提供了这五个时间段年均新增劳动供给和就业人口数据。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1979-1984年间即改革初期，年均新增就业人数大于新增劳动供给人数，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劳动需求超过了劳动供给，体现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力的释放。在1984-1989年期间年均新增劳动供求基本平衡，略显供大于求。此后，新增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的供求缺口开始拉大，并表现出逐年扩大趋向。1990-1996年期间，新增劳动供求缺口年均均为40万人。到了1996-2002年间的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经济出现需求疲软，就业严重不足，此时供求缺口上升为145万人。2002年以后，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就业形势稍有缓和，但2002-2007年间年均新增劳动供求缺口仍达48万的高水平。

时间段增长方式差别显著，符合邹至庄断点检测（见下文分析）；另一方面1990年的劳动统计口径发生变化，1990年前后数据不可比，故分为两阶段处理。

表1。劳动年龄人口、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万人）

	年均新增劳动 年龄人口	年均劳动 参与率	年均新增 劳动供给	年均新增 劳动需求
1978-1984	1402	97.6%	1368	1434
1984-1989	1781	81.6%	1454	1426
1990-1996	998	74.1%	740	700
1996-2002	1396	65.9%	933	798
2002-2007	1034	73.8%	698	65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年各年数据推算结果。

与严峻的就业形势形成对照的是，2002-2007年的年均产出增长率为10.82%，比上一期提高了2.39个百分点。事实上，就业的增长自改革以来一直保持下降趋向，不论宏观经济运行是否良好。这正是图1中观察的结果。具体而言，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78-1989年的9.25%上升到1990-2006年的10.18%，而对应期间的就业增长率分别从3.09%下降到1.05%。换言之，实际GDP的就业弹性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即从前一个时期的0.33下降到后一个时期的0.09。另一个就业形势恶化的表现是，劳动的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这两点足以表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在显著减弱。

为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动态关系的结构特征，下面我们来观察各个产业的产出增长与就业变动表现。表2显示了整体经济与三次产业就业弹性在五个时期内的变动趋势。从整体经济来看，总就业弹性自改革以来基本保持下降趋势。在1996-2002年期间，即在通货紧缩和宏观需求不足的双重困扰时期，总就业弹性表现有些异常，即略高于前后两个时期。进一步考察三次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表2中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特征，即农业与非农业的就业弹性表现出很强的负相关性，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农业）这五个时间段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20、0.48、-0.43、0.32和-0.69。从农业部门就业弹性的这种变动趋势中，基本可以观察到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向外转移的迹象。对应期内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就业弹性分别为0.62、0.38、0.16、-0.05和0.45。这说明，自改革以来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基本保持下降趋向，虽然近期出现一些反弹，但这种迹象还有待作进一步观察。最后，就第三产业而言，这五个时期的就业弹性一直为正，虽然近期有所下降，但还是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第三产业是中国创造就业的主渠道。

表2。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各时期实际产出年均增长率 (%)				各时期年均就业弹性			
	总产出	A	B	C	总弹性	A	B	C
1978-1984	9.25	7.29	8.92	11.87	0.33	0.20	0.62	0.67
1984-1989	9.80	3.09	12.04	12.54	0.29	0.48	0.38	0.44
1990-1996	11.88	4.31	16.49	10.64	0.09	-0.43	0.16	0.65
1996-2002	8.43	2.98	9.20	9.81	0.13	0.32	-0.05	0.28
2002-2007	10.82	4.54	12.36	10.94	0.08	-0.69	0.45	0.3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数据推算结果。
注：A = 第一产业；B = 第二产业；C = 第三产业。

总的来说，一方面，自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无疑已经形成了一个增长与就业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机制。从就业方面来看，可以推断，大规模的劳动力源源不绝地从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正是受惠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它能够将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的劳动力吸收到生产中来。但这绝不是自然而然或轻而易举的事。在世界范围，具有与中国相似经济结构和增长纪录的国家，如印度，虽然也存在类似的劳动力转移趋向，却远没有中国这般突出。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不同步，表现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日渐衰微，主要反映为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速度的放缓。为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和体制特性。

二、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动态：理论阐释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背后的直接推动力是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远超过了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增长率达到年平均11.1%，在90年代更上升至13.7%，不仅远高于同期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即分别为5.5%和2.7%，以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3.6%和3.9%，而且超过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平均水平---在这两个时期东亚地区的平均水平都为9.3%。

工业化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不仅表现为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快速增长，还表现为工业经济的增长还是非工业经济增长的引擎。图2描述的是1978-2007年期间的工业部门与非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曲线。从图2中可以看出，以不变价格产值计算的曲线始终远高于以当年价格产值计算的曲线。这反映了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升，透过相对价格变动向非工业部门转移，从而促进整体经济增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条曲线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意味着这种生产率转移还呈现出加速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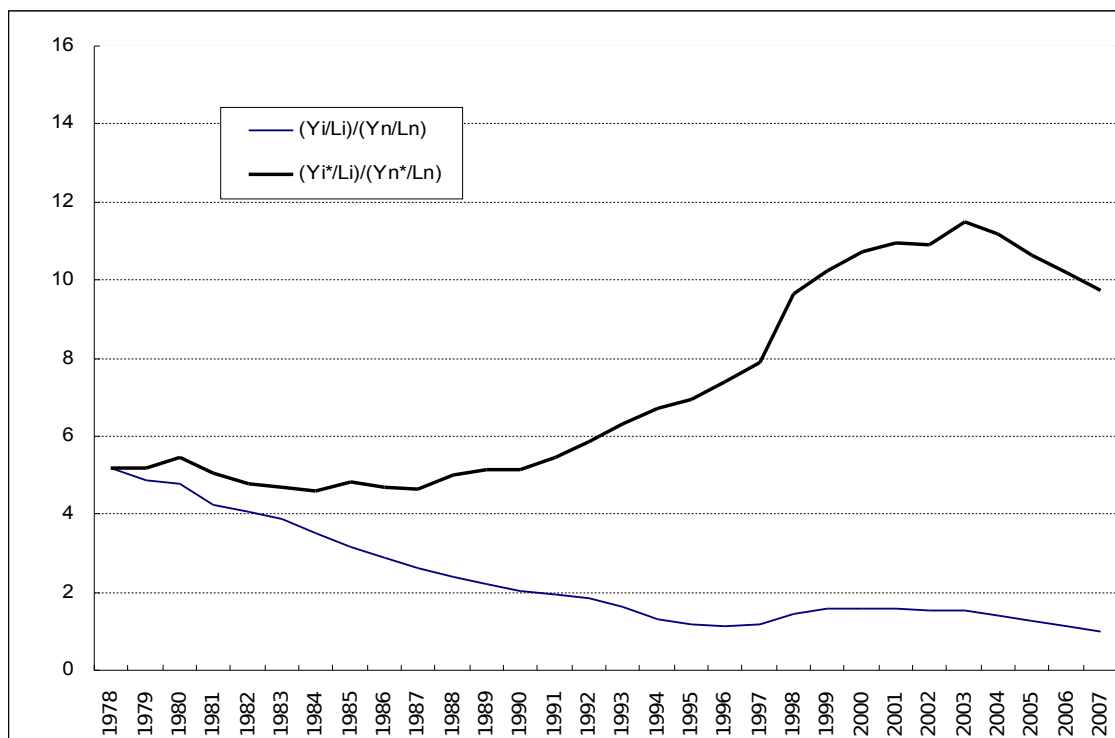


图 2。工业部门对非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注：Y = 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其组成部分，其中带 * 为 1978 年价格计算的产值；L = 总就业人数；下标 i 和 n 分别代表的是第二产业（即工业加建筑业）和非第二产业。

在相关理论文献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这个理论流派吸收了大量的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转型增长理论）倾向认为，工业部门（或制造业部门）有较强的动态规模效益。这也正是“卡尔多---维尔敦定律”^[1]所概括的。对此的理论解释是，生产率的提高（即动态效率）取决于技术条件与有利需求因素的相互作用^{[2][3]}。需求带动生产率进步，表现为边干边学效应、诱导更新和创新投资以及整体经济的专业分工深化，概言之，就是集体学习效应。新熊彼特创新理论^[4]进一步将需求因素拓展为经济条件，认为除需求因素外，还应包括体制特性。体制因素就是因应需求环境获得集体学习效应的能力，而适合集体学习效应的体制要求固定性，也就是相关经济主体之间的长期导向关系，这与资源配置效率所要求的体制灵活构成矛盾。这样也就存在两种效率的取舍问题，即为获得动态效率就可能牺牲配置效率。

这些强调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和制度特性的理论文献，为我们分析中国经验提供了较好的分析视角。我们来再次观察图2。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图2中这两条分别代表以当年价格和不变价格计算的工业对非工业的相对生产率曲线，在20世纪80年代即改革的前半期表现为下降倾向，进入90年代以后开始上升。改革前半期这两条曲线的下降似乎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根据“卡尔多-维尔敦定律”，工业部门普遍比非工业

部门有较高的生产率提升速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来推动。这种体现中国资源配置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转移，对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自然有消极影响。因为新加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主要是非熟练技术工人，因此劳动力的迅速扩张，必然对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施加下降压力。相反，90年代以后曲线开始相向上移动，这表明中国经济又重新回归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资本深化”的路径上。

根据前面文献概括，一个经济体生产率的提升是结构-制度安排与需求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方面的结合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增长路径。就需求环境而言，支撑体制改革下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需求来源不外乎是消费和投资。我们可以从需求因素入手探讨中国的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特性。

考察消费和投资的变动趋势可以发现，1993年中国经济总需求构成出现一个重要转折，这就是在1978-1992年的消费需求比重明显高于1993-2007年的下半期，而投资需求则明显低于下半期。与此相对应的是如图3所显示的工业相对劳动生产率曲线的变化。由此可以判断，20世纪90年代以后，消费增长让位于投资增长，后者变成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而在90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在依循下面的因果纽带中得以实现：消费诱导投资，带动整体需求增长，因此既能吸纳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转移，又能透过动态规模效益进一步提升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形成生产与消费、工业与整体经济的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能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两方面。一是工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的上升，以及工业内部一系列新兴的、耐用消费品产业的兴起。前者对应的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趋向，因而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后者对应的透过动态规模效率改进了工业生产率。二是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这种收入分配格局使得大规模消费能够配合大规模生产，起到诱导投资的作用。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被彻底打破。正是这种收入分配的恶化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变的关键。就中国的基尼系数看，虽则不是理想指标，其数值的变动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向。在1978年，基尼系数数值在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户分别是0.16和.21，就国际比较看都是相当低的水平；至1992年，城镇居民户的基尼系数上升至0.25，但仍属中等水平，农户家庭却已达高水平的0.31；再至2000年，有关数值更分别达0.32和0.35^[5]，都已是国际公认的偏高水平。因此，从90年代起，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开始让位于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后者变成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与此对应，劳动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趋于减弱，工业部门的动态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愈趋增强。

现在转到体制方面。上面提及的改革前半阶段平均化的分配格局无疑是建立在特定的条件基础之上，即中国经济基本上仍是公有制部门占主导，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模式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概念上，中国的企业改革通常被描绘成这样一个过程，政府透过多种途径雇佣和激励公司管理阶层的创新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又是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即企业内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包括地方政府、职工、所在地社区、金融机构和其他业务相关部门等构成一种规范企业发展的制衡机制。这种特征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同样可见于其他公有经济部门，如集体

所有制企业和乡镇企业。

改革以来，有关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公有制企业的经济表现，相关文献一直存有争议。但有两个典型事实大致是公认的：第一，国有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和2002-2007年间）的需求扩张年代的表现要比在90年代需求停滞时期的表现好得多；第二，整个改革年代大型国有企业的表现要比中小型国有企业，甚至可能比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其他所有企业的表现都要好得多。根据这两点我们可以设定，在改革的前半阶段，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上的大规模消费与微观层面上企业的长期导向行为特征基本是配合的，也即平均化的分配格局与企业的利害相关者问责体制的配合。然而需求的扩张与结构-制度安排这种联结关系与市场化的改革是不相容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强化经济发展的微观激励机制，从而冲击了上述宏观环境与微观机制的配合。在宏观层面上，这种改革倾向势必减少职工的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从而削弱了整体经济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平均化程度，导致消费规模下降。在微观层面上，这种改革弱化了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忠诚或长期职责。结果，在1995-1997年中国的企业制度经历了一个结构调整、规模收缩和所有制转变的痛苦过程。兼之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宏观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

作为对此反应，中国政府转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市场补救政策，如凯恩斯式的积极财政政策、福利政策措施，和恢复国有企业活力和扶持够有银行的政策措施，以及暂时搁置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等，这样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在危机四伏的1998-2000年期间得以持续^[5]。但这种政策反向并没有导致原来增长模式的复归，而是出现了类似东亚经济体的增长模式，即资本深化的工业化增长路径，而且资本深化步伐趋于加速。这种增长模式一方面获得了投资的递增回报，即动态规模效率；另一方面导致生产过程的劳动吸纳能力下降和社会就业结构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下面我们主要讨论这种增长模式的转变对就业的具体影响。

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对就业的影响：实证检验

本文的中心议题是，揭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即自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劳动密集的增长路径转变到此后资本深化的增长路径，对就业的影响。为进一步考察这种转变对就业影响的结构特征，下面我们分别分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来做一个统计上的检验。

我们先来考察不同的经济部门。这里将整体经济分为工业和非工业两个部门，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ln L = \alpha + \beta \cdot DUM + \gamma \cdot \ln I + \delta \cdot DUM \cdot \ln I + \varepsilon \quad (1)$$

模型中 L 代表就业总规模（即就业人口的数量）； I 代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根据邹至庄断点检验，工业和非工业部门在1978-1990年间和1991-2006年间这两个时期在结构上有显著的区别，因此在回归模型中增加虚拟变量 DUM 。这个虚拟变量在1978-1990年间取值为0，其后各年份取值为1。 I 数据序列以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其中1978-1989年的价格指数是根据工业与建筑业对应指数分别按0.6与0.4的权重加权平

均估算的结果，而其后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表3给出了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影响就业增长各个解释变量在统计上都是十分显著的。但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对于不同部门和不同时期其影响各不相同。在1978-1990年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对就业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固定资产每增加1%，对工业部门带来的就业增长平均约为0.269%，略低于对非工业经济部门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的0.376%。这说明工业部门相对于非工业部门有更高的资本投入，更倾向于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但在1991-2007年间，不论是工业部门还是非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显著下降，此时工业部门与非工业部门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083和0.053。这说明整个经济从改革以来进入90年代以后经济的增长路径表现为一种资本深化的过程。

为获得更多的证据，我们再分不同地区来考察。按照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区域划分标准，将中国经济分为三个区域：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样划分的依据是，这三个地区有不同的劳动专业化分工模式。东部地区侧重制造业生产，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侧重初级产品生产，这种差别尤其反映在出口产品上。现在我们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ln L = \alpha + \beta \cdot DUM + \gamma \cdot \ln I + \delta \cdot \ln X + \mu \cdot DUM \cdot \ln X + \varepsilon \quad (2)$$

这里， X 代表出口，用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其他的所有变量与方程(1)的含义相同。其中虚拟变量DUM取值，既与方程(1)一致，也符合邹至庄断点检测。此外，这里选择出口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是因为出口是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近年来中国的出口表现出强劲的增长。

表3也给出方程(2)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这些解释变量在统计上也是非常显著的。就 $\ln L$ 和 $\ln I$ 的相关性而言，这三个地区的相关性比较接近，东部地区略为偏高，说明投资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区域差别不是十分显著。而在 $\ln L$ 和 $\ln X$ 的相关性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的相关系数为0.074，中、西部地区分别为0.134和0.253。进入第二个时期即1991-2007年间， $\ln L$ 和 $\ln X$ 之间的三个区域的相关系数都出现显著的下降：东部地区的相关系数变为-0.031，中、西部分别为-0.020和-0.022。这表明，资本深化的趋势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的出口部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无不例外。

表3。回归分析：就业、投资和出口

方程 (1) : $\ln L = \alpha + \beta \cdot DUM + \gamma \cdot \ln I + \delta \cdot DUM \cdot \ln I + \varepsilon$ (1978-2007)						
	α	β	γ	δ	δ	Adj- R^2
工业部	7.240	1.306	0.269	-0.186		
门	(32.649)***	(4.047)***	(7.866)***	(-4.036)***		0.843
非工业	7.927	2.642	0.376	-0.323		
部门	(23.071)***	(7.298)***	(7.827)***	(-6.478)***		0.948
方程 (2) : $\ln L = \alpha + \beta \cdot DUM + \gamma \cdot \ln I + \delta \cdot \ln X + \mu \cdot DUM \cdot \ln X + \varepsilon$ (1978-2007)						
	α	β	γ	δ	μ	Adj- R^2
东部地区	7.795	1.561	0.150	0.074	-0.105	
	(23.377)***	(5.119)***	(9.478)***	(2.564)**	(-4.958)***	0.988
中部地区	7.420	2.058	0.101	0.134	-0.154	
	(45.117)***	(7.916)***	(5.137)***	(6.898)***	(-7.416)***	0.983
西部地区	6.195	3.407	0.069	0.253	-0.275	
	(26.106)***	(7.810)***	(2.269)**	(8.966)***	(-7.693)***	0.96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和地区统计公告各年数据。
注：*** **和*分别表示1% 5%和10%的统计显著程度；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

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就业含义：可行性评价

从前文的论述和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从“资本广化”模式向“资本深化”模式转变造成了就业增长实质性的下降，亦即这种模式与政府所追求双重目标，即国内生产总值与就业的并行增长并不相符。这自然而然要问，中国经济可否返回到改革初期的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路径上？这种增长模式不仅符合市场原则，而且也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因而也得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这种增长模式是有效率（资源分配效率），而且也是公平的，因为它能创造更多的就业，而且能给更多的人口带来更多的实惠。尽管这种增长模式不利于工资的增长，但他们认为，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和福利政策可以抵消这种负面影响。

然而，判断两种增长模式孰优孰劣并不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事。就增长的效率而言，资本深化增长模式的生产效率的重要意义应当超过劳动密集增长模式的资源配置效率。首先，两种效率的净效应到底如何，应是个实证问题。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改革第二阶段的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都明显高于第一阶段。尤其在需求不足大背景中，资源的稀缺性不是必然的约束条件，那么可以认为，在这个环境下，对经济增长来说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可能要低于生产效率的重要性。而且有证据显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严重的宏观需求不足。

就增长模式的就业效应而言，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比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需求约束的经济环境中却未必是必然的事。如果造成需求不足的原因与工资率过高无关，那么工资率的下降（为诱导资本替代劳动）并不必然导致就业的增加。因为工资率的下降，一方面会导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下降，这样可能会造成宏观需求的下降；另一方面，工资率

的下降会提高资本对劳动的相对价格，出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而就业是否增加，就要取决于这两种影响何者占主导地位。

需求问题还可引申出，增长模式可否回归到原来的劳动密集的增长路径的可行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几年中国总支出中出现加速增长趋向的是总投资而不是总消费。消费需求的相对萎缩，自然就产生一个对日益激增的以消费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问题。出口也许能够作为是国内需求的替代选择。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个现象：近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在不断的扩大，亦即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造品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市场。出于对产品市场销售、从而对创造就业的考虑，这可能就是中国愿意与美国维持这种非正常的经济关系的背后原因。中国目前正同时以两种方式在补贴美国经济：一是为美国提供廉价的商品；二是中国将持有的庞大的而且仍在日益膨胀的、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作为官方外汇储备，亦即为美国提供廉价的贸易信贷。尽管如此，这种双重补贴并不能保证这种关系能够持续下去。贸易摩擦已经成为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的常态。由此可见，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并不见得就没有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严重。

而当前的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中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就可行性而言，消费需求的放缓使得经济增长必须转而依赖投资需求，也就是必须依循“生产投资品以生产投资品”的增长模式。而消费需求增长放缓是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这是因为收入分配格局的愈趋不平均，归根到底是因为公有制部门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就合理性而言，早在改革年代的上半期，中国的经济体制就具备获取集体学习效应和动态规模效益所需的能力，尤其表现为国有工业企业及其利害相关者的长期导向关系。随后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这种能力，作为国有工业企业的核心部分的大型企业，与政府、在岗职工和银行等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导向关系依然存在，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非国有大型企业也趋于显现出近似体制特性。因此，大型工业企业成为了资本深化增长模式的主要承载者，在1998年之后迅猛扩张。

五、结语

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张一直以来是中国政府所追求的双重目标。在改革的前半时期，中国经济以劳动密集的增长方式，取得了产出和就业的双重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表面看来与政府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它的缺陷在于，劳动报酬的增长严重滞后于产出的增长，表现为是劳动收入在总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其后果是收入分配趋于恶化。正是由于这种收入分配的恶化，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宏观需求不足，导致原来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转向资本深化的增长路径。事实表明，这种增长路径能够实现产出的快速增长和劳动报酬的不断提高。其缺陷是，创造就业的能力表现不足。因此，这种增长模式是否能维系下去，取决于资本深化的工业化所带动的生产率提高，能否促进

有较强劳动吸纳能力的服务业的发展。

评价这两种增长模式的可行性，如果从政府所追求的目标来考虑，我们的结论是：这两个模式各有其优缺点。但从现实性来考虑，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比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更具可行性。当然，为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劳动报酬不断提高的就业增长这双重目标，政府还必须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采取更多有效的措施。

参考文献

[1] Kaldor, N. Causes of the Slow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Kingdom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2] L. Tayl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flation, and Growth: Lectures on 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 Theory [M]. MIT Press, ch.9-10, 1991.

[3] M. Syrqui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new growth theory [M], in L.L. Pasinetti and R.M. Solow [ed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tructure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1994.

[4] D. Lo and R. Smyth. Toward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M],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8 (6), pp.1-18, 2004.

[5] 李实、张平、魏众、仲济垠等.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6] Dic Lo. China after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ism [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8, 2001.